揮筆灑墨為所當為

相信文字具有力量是知識份子堅定不移的信念; 揮筆灑墨,為所當為則是知識份子的擔當。

目 次

〈長篇書評〉

金融危機與改革之制度奧秘:日本模式的重探

- 1. Amyx, Jennifer Ann
- 1. Japan's Financial Crisis: institutional rigidity and reluctant change

1

2. Gao, Bai 2. Japan's economic dilemma: the institutional origins of 张珈健 prosperity and stagnation

3. Vogel, Steven K

3. Japan Remodeled: how government and industry are reform Japanese capitalism

〈短篇書評〉

趙鼎新	社會運動與革命:理論更新和中國經驗	張迪皓	13
Paul C. Light	The Search for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洪健庭	19
Mark Leonard	中國怎麼想?	張鈞凱	23
藍佩嘉	跨國灰姑娘一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家庭	顏維婷	27
Helen Sullivan &Chris Skelcher	Working Across Boundaries: Collaboration in Public Service	張國偉	31
Stephen M. Walt	馴服美國 <mark>權力:對美國首要地位的全面回應</mark>	洪銘德	35

政治科學季報

二〇〇九年六月 第廿二期

6865B T > T > T > T |

沓深编輯顧問

石之瑜、江瑞祥、蘇彩足

編輯顧問

謝芷廷、蘇軍瑋

主 編

吳宗翰

執行編輯

侯惠雋

排 炬

陳浤鎰

从 扣 七 日

邵智偉、陳姿潔、陳亮宇、許容禎、楊珮瑞、

郭俊廷、覃玉蓉、黄威霖、曾彦中、黄禾田

發 行 所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暨研究所

地址:台北市徐州路21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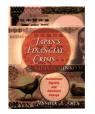
電話: (02) 2391-8756

金融危機與改革之制度與秘:日本模式的重探

張珈健 / 臺灣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生

自 2006 年底美國「次級房貸風暴」伊始,「金融海嘯」的後續演變與最終解決便成為舉世關注的焦點,更讓美國跨越種族藩籬(不論是暫時或永久)而產生首位非洲裔總統歐巴馬。這意味著即使作為自由放任市場機制的堅定捍衛者,美國似乎別無選擇的必須改變(Change),精確的說,就是展開金融自由化後的再管制工程(Re-regulation)。

隨著長期主導金融管制典範的華爾街模式頹敗 「我現階段仍然缺乏「最適模式」作為見賢思齊 的典範,研究者與決策者只能逆向的從失敗案例的 抽絲剝繭尋找殷鑑。如此一來也就讓陷入「失敗不 與政策建言已經汗牛充棟,仍然具有高度研究, 值。本書評擇取的三部著作皆成書於 2000 年後 所 前人掌握更充分的實證資料;更關鍵的是,他們 前人掌握更充分的實證資料;更關鍵的是,他們 別從不同面向剖析日本金融制度,同時解釋 期度改革的實質內容,以及解釋改革面的機 制度改革的實質內容,以及解釋改革面的機 制度改革的實質內容,以及解釋改革面的機 制度改革的實質內容,以及解釋改革的的 制度改革的影響提供 整體一致(coherent)的理解,避免發展型國家理論 新古典經濟理論侷限於特定現象的解釋(ad hoc)²,



書名: Japan's Financial Crisis: institutional rigidity and reluctant change 作者: Amyx, Jennifer 出版者: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出版地: New Jersey 日期: 20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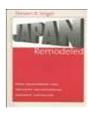
頁數: xix+365 pages ISBN: 0691128685



書名: Japan's economic dilemma: the institutional origins of prosperity and stagnation

作者: Gao, Bai 出版者: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出版地: Cambridge 日期: 2001

頁數: xi+300 pages ISBN: 0521793734



書名: Japan Remodeled: how government and industry are reform Japanese capitalism 作者: Vogel, Steven K 出版者: Cornell University

ress

出版地:Ithaca 日期:2006 頁數:249 pages ISBN:0801444497

經濟理論只能解釋日本經濟 衰退。

¹ 華爾街模式指的是脫胎自「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的金融管制方法。「華盛頓共識」最早可追溯自 1973 年 Mckinnon 出版「經濟發展中的貨幣與資本」(Money and Capital in Economic Development)一書,提出開發中國家推行金融改革降低「金融壓抑」所導致的資金無效配置,將有助於資本流入、擴大投資以及幣值穩定。隨後 1989 年 John Williamson在國會作證支持對第三世界的債務處理計畫:「布雷迪計畫」(Brady Plan),並擬定 10 點政策清單:財政紀律、縮減赤字、稅收改革、利率與匯率自由化、外資與貿易自由化、私有化、放鬆管制、產權改革。而後美國財政部、世界銀行、IMF 皆抱持這種觀點,並以華盛頓為根據地向國際推展,而被稱做「華盛頓共識」。華盛頓共識中最關鍵的三大支柱為:財政節約、民營化、金融市場自由化。請參考 Williamson(2004) 與Stiglitz(2002: 53-73)。

² 簡言之,發展型國家理論只能解釋日本經濟成長,而新古典

也就更可以作為金融管制革新的借 鏡。成書最早的杜克大學社會系教授 高柏(Gao Bai)以整體性分析視角整合 國際經濟秩序、國家金融體制和企業 治理三層次中變項的因果關係,指出 布列頓森林體系瓦解和金融自由化導 致日本企業的不當投資, 釀成泡沫危 機和十年衰退(Gao, 2001: 14-17); Amyx 以「網絡化制度」(network institutions)的分析角度,解釋仰賴非正 式關係、私人互動、高度封閉的日本 金融監理系統在瞬息萬變的金融市場 中失效,不僅無能阻止銀行壞帳,更 在民主化進程中成為抑制改革的保守 力量(Amyx, 2004: 31-34);以《更自由 的市場、更多的管制》(Freer Markets, More Rules)(1996)一書揭示了自由化 與再管制關係的 Steven Vogel, 歷經十 年後提出更精闢且全面的日本制度變 遷觀察。在本書《重塑日本模式》中, 他以「多樣性資本主義」(Varieties of Capitalism)的角度³,剖析原有制度如 何塑造改革路徑,而改革過程又辯證 的影響傳統日本模式,形成既非舊日 本又非美國模式的嶄新樣態(Vogel,

³ Peter Hall 與 Soskice 在《多樣性資本主義: 比較利益的制度基礎》(2001)中以「策略互動」 (Strategic Interaction)的思維,將制度理解為行 動者與制度、行動者之間策略互動的關係結 構,主張社會行動--「勞動市場、企業治理與 教育訓練」受到國家制度--體制的制約與調 節,因此政策與制度研究必須把握主要行為者 (政府、企業與社會)如何在特定國家政經系絡 中展開互動(Hall and Soskice, 2001: 4)。他們以 公司(Firm)作為最重要的分析單位,提出兩種 不同的經濟體制類型學,以及不同經濟體制中 行動者的互動邏輯:在自由市場經濟體 (Liberal Market Economy, LME)中行為者傾向 市場競爭機制、階層關係與正式契約;協調市 場體制中(Coordinative Market Economy, CME) 行為者則習慣利用非正式制度、網絡關係與合 作來建立「可信承諾」(Credible Commitment) (Hall and Soskice, 2001: 8-12) •

2006: 4-7) •

基本上,三本書都可以獨立進行 討論與評介,不過基於本書評的問題 意識,以及更有機的對比個別論證, 後文將分為兩部份。第一部份扼要表 述三者的主要觀點, 凸顯三者制度分 析的差異;第二部份我將以 Amyx 著 作中的兩個問題為主軸,讓三本書展 開對話。Amyx 認為,日本金融危機存 在著兩個必須被解釋的問題,首先, 何以在長達40年經濟成長期具備高彈 性、危機處理能力強的日本模式,在 1990 年代泡沫危機時卻毫無用處、反 應遲緩; 其次是被迫進行改革時, 過 往成就卓越的日本發展型官僚為何左 支右絀、曖昧不明而難以形塑果斷且 高品質的管制革新,讓復甦遙遙無期 (Amxy, 2004: 1-7)? 換句話說,第一個 問題涉及如何解釋日本模式與危機的 因果關係,第二個問題則與如何正確 理解日本改革相關連。

一 三種制度分析視野:人際網絡、國際結構、整體經社安排

(一)Amyx 的制度分析:網絡化制度

Amyx 認為東亞國家能力的關鍵 不在於階層化的強制權力,而是官僚 與社會之間被精巧管控的盤根錯節非 正式關係(informal relational ties),亦即 網絡。這種因為長期互動而產生信任 的「軟性」社會關係,界定了個人的 誘因結構,使成員的行為舉止符合組 織的共同利益而克服集體行動的難 題,確保國家政策的落實(Amyx, 2004: 14, 16-17, 24)。作者提出兩個界定網絡 本質的指標:組成網絡的「樞紐」(hub) 多寡和進入網絡的門檻 (accessibility),據此區分出西方式網絡 與日本網絡的差異。西方的網絡化制 度沒有特定發號施令的組成樞紐,進 入門檻甚低,屬於「平等主義網絡」 (Egalitarian Network),網絡化制度扮 演補充正式制度的角色;日本的網絡 化制度具有權力階層性,指揮樞紐較 少(掌握絕對權力地位),進入門檻甚 高,屬於「寡頭網絡」(Aristocratic Network),網絡化制度經常取代正式制 度(Amyx, 2004: 21-22)。

Amyx 主張日本金融建制的實質不是明文規定的正式法律架構,而是金融政治場域中的行為者(官僚、政客、銀行經理人)彼此間非正式的互動模式,該互動模式的特質是私人性、非正式、不透明與排他性(Amyx, 2004: 257)。這種金融網絡是以大藏省(MOF)為核心(core)對外輻輳,並以三個樞紐連結外部行為者:政治場域、企業場域(金融機構)、其他部門(特別是日本央行),統御整個金融體系。

(二)高柏的制度分析: 監控與協調的制度矛盾

承繼組織經濟學家 Kester 的思 路,高柏指出金融體制必須處理企業 交換的「協調」(Coordination)問題, 以及所有權與管理權分離而導致的 「監控」(Supervision)問題。通常,控 制與協調存在替代(Trade-off)關係,重 視控制將會削弱協調,關注協調則忽 略監控(Gao, 2001: 29-30) 4。高柏認為 戰後日本奇蹟乃維繫於資本穩定投 入,實現此條件的制度架構則在於重 視「協調」(Coordination)而輕視「監 控」(Supervision)的金融生產體制⁵。此 體系的危機有二:過度競爭導致的資 源浪費、缺乏監控產生的道德危機。 不過在布列頓森林體系下,日本得以 根據國際收支狀況調控貨幣政策,嚴 格資本管制調控銀行與企業,進而實 現穩定經濟的作用。但是在固定匯率 秩序瓦解、國際要求資本自由化,本

⁴ Kester 認為,日本與美國公司治理體系皆試 圖解決企業利益相關人的控制與協調問題。 Coase 與 Williamson 主要關注協調問題,也就 是提高交換效率作為治理過程的核心關注,這 便體現在日本體制中,日本企業關注降低交易 成本、對特定關係產業的投資,因而促成穩 的非正式商業關係,但股東經常被迫承擔潛在 代理/監控成本;英美企業則強調減少所有權 與控制權分離的代理成本,依賴正式法律機制 規範交易個方的商業關係。準此,追求交易效 率或降低代理成本,構成英美與日本治理最大 的差異(Kester, 1996: 108, 121-123)。

⁵ 高柏認為日本的協調體制有幾個支柱:政府 政策支柱:包括大藏省的寬鬆貨幣政策、限制 銀行競爭與進入門檻的「護送艦隊」政策 (Convoy System)、以間接融資為基礎的信用體 系、保障特定企業資金來源的「主銀行系統」 (Main Banking System);企業行動支柱:企業 間相互持股與「系列」(Keiretsu)壟斷財閥;社 會福利支柱:由於國家將資源高度集中企業發 展產生社會福利的缺口,則由永業制穩定社 會。

國企業的海外佈局,皆使得政府調控經濟能力面臨「不可能三元困境」 (Impossible Trinity)的挑戰⁶,進而走向 泡沫經濟危機(Gao, 2001: 35-39)。高 柏的分析整體性的解釋了特定歷史結 構下日本金融體制的生成與發展,並 明確指出在既有制度框架下,外部資 本結構變革轉變引發內部政經危機的 因果解釋。

(三)Vogel 的制度分析:多樣性資本主義

當 Vogel 在 1996 年《更自由的市 場、更多的管制》中宣稱「國家是改 革的倡行與主導者,面對分歧的社會 利益團體通常擁有相對自主性,能夠 主動塑造社會價值、操控團體壓力, 展開偏差性動員,因此制度變遷的過 程將受制於管制單位的目標導向(Goal) 與組織安排(Organization)」(Vogel, 1996: 1-4, 17, 21-24), 幾乎預示了他必 須再出一本書來處理制度變遷過程中 私人企業的能動性。事實上,在本書 《重塑日本模式》中,Vogel的核心旨 趣與過往雷同:「如何正確理解日本如 何改革 (Vogel, 2006: 3)。相對於 1996 年時他的「國家中心論」思考:「國家 機器的制度導向與組織網絡使得日本 即使面臨美國強大自由化壓力,改革 過程仍然口惠而實不至」(Vogel, 1996:

51-54),如今 Vogel 用了更複雜的架構來支持更簡潔的答案:「日本(包含政府、企業與人民)不想變成外在世界所期望的樣子,或至少不想全盤改革成美國模式,所以這種對改革曖昧不明的態度,事實上反應/證成了民主體制和日本模式的作用」(Vogel, 2006: 43-45, 2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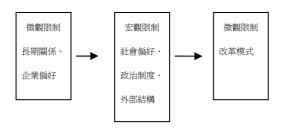
Vogel 的分析架構建立於「多樣性 資本主義」之上,多樣性資本主義關 注現有的制度系絡—國家模式 (National Model)如何影響改革路徑。 所謂國家模式乃是眾多緊密相連、休 戚與共的政經社會單元(行動者)構築 之秩序。大舉偏離既有秩序(國家模式) 的改革面臨更高的失敗風險,也就讓 沿著歷史軸線的漸進微調成為改革唯 一途徑;若再加上經濟社會學的看 法,制度變遷是「觀念擴散過程」 (Diffusion Process)。上述的動態過程可 以表述如下:國家制度系統被界定為 機會與限制,企業將發展出適應此系 統的社會關係,而隨著競爭環境轉 變,企業將衡量轉型的邊際經濟效益 是否高於放棄既有社會關係的固定成 本。一般而言,企業調整的過程中首 要目標在維繫社會關係,甚至連結舊 有網絡與新體系為共生結構,讓改革 同時符合利益、正當性與規範目標。 而面對改革壓力的決策者(政府、企業 或勞工),在不同體制中會選擇較符合 國家模式的方法來取得集體行動的共 識(Vogel, 2006: 11-22)。

於是日本改革的歷史制度邏輯就 是下圖所呈現的微觀—鉅觀互動:企 業偏好與制度(現存體制安排與官僚意 識型態)共同塑造社會對改革內容與方

⁶ 資本自由流動、固定匯率、獨立貨幣政策三者 是國家處理金融、貨幣問題無法同時實現的三 元目標。一旦追求固定匯率、獨立貨幣政策, 則必須進行資本管制,否則資本流動會抵銷膨 脹(或抑制)景氣循環的政策;若是力求資本自 由流動、固定匯率,則勢必放棄獨立貨幣政策 制訂權;倘若允許獨立貨幣政策與資本自由流 動,則必然需要透過浮動匯率的方式確保貨幣 政策的有效性,也就因此無法保留固定匯率的 制度設計(Eatwell and Taylor, 2000: 82-83)

式的期待,此期待又將制約變遷路徑。更重要的是,歷史結構決定企業與社會競爭立場,政治制度則確立決策者如何衡量不同利益並展開分配性舉措(Vogel, 2006: 17, 22)。

引自 Vogel(2006: 17)



二 透視日本模式

(一)日本模式與金融危機的因果分析

在這個問題範疇中,三位作者必須指出日本金融制度能力(institutional capacity)在不同條件下的轉變,並且指出該條件在 1980 年代末期直到 1990 年代初期的轉變,如此才能整體一致的解釋日本以往的成就與 1990 年代之失敗。以社會科學的語彙,必須確認關鍵的中介變項在 1990 年代左右的轉變,改變了日本既有金融制度能力的效果(自變項),從而影響了金融表現—危機(依變項)。

Amyx:金融善治(good governance) 的透明度

Amyx 認為網絡化模式在金融分業、資本管制與固定匯率的時代能夠有效降低金融產業的交易成本,主銀行系統和私人機構具備共同誘因審慎信貸、監控損失,資訊不透明的體系讓官僚在處理(或掩蓋)銀行問題時掌握先機,避免系統性崩潰(如擠兌或傳

染效應)(Amyx, 2004: 126-127)。但是網絡化模式需要兩個前提(中介變項)才能完善運作:有效管制的透明度門檻甚低、網絡樞紐的穩定度極高(Amyx, 2004: 31-34),其中「樞紐穩定度」是Amyx 解釋改革遲緩(policy inertia)的中介變項,將在下一部份討論。

藉由透明度的角度, Amyx 雖然整 體一致的解釋日本奇蹟與危機,但是 她針對「網絡化模式」和「監控能力 低落」之間因果關係的討論有欠完 整,使得 Amyx 幾乎缺乏論證的宣稱 網絡化模式(或非正式關係)便是道德 危機式管制,無法適應既複雜且高度 要求透明度的現代金融市場。Amyx 的 判斷基礎應該來自於日本的失敗經 驗--「失落十年」,以及強調市場機 制、正式規則的「法治」(rule of rule) 管制革新具有優越性, 這樣的看法在 新自由主義當道的2000年前或許爭議 較少,但是當「金融海嘯」證明最貼 近市場及法治的「西方模式」在監控 道德危機的表現上未必理想,則 Amyx 論斷的說服力便受到限制7。

⁷ Vogel 也認為 Amyx 的討論既沒有解釋金融 危機的發生也無法說明官僚的延遲回應(Vogel, 2006: 49)。

2. Vogel:泡沫危機與政策失敗

Vogel 指出許多企圖解釋日本危 機的研究往往搞混了兩個不同層次的 現象:長期經濟表現—長達四十年的 成長、短期景氣復甦--景氣循環或泡 沫經濟的「軟/硬著路」。前者從制度面 向可以獲得充分的解釋,後者則應該 觀察總體經濟的政策管理。一旦學者 將日本危機視為長期現象而採取制度 分析8, 勢必強調日本模式的缺陷並將 泡沫危機視為日本模式的產物,進而 把1990年代前驚人成就輕描淡寫為偶 然的幸運,這種看法當然難以通過發 展經濟學者的批判或經驗檢證。但如 果將「失落十年」視為數個短期危機 的集合,則研究者便可以同時合理的 解答昨是今非的矛盾現象: 日本模式 創造了過去成就,短期經濟困境的管 理失當導致 1990 年代危機。Vogel 便 是採取這種途徑來理解日本,將泡沫 危機和政策失敗視為兩個關鍵的中介 變項,先後出現的綜合效果抑制了 1990 年代時日本模式的功能(Vogel, 2006: 35-39) •

準此而論,1990 年代的日本困境 可以表述如下:泡沫經濟導致瘋狂投 機,惡化了日本模式中監控機制孱弱 的缺陷,而具有高度自主性的大藏省 與日本央行過去從未經歷資產價格飛 漲而在初期低估泡沫危機,直到危機

8 Vogel 稱這類學者為「結構危機學派」 (Structural Crisis School),因為他們共同強調 日本模式內含的結構限制無效率而產生危 機,不過 Vogel 評論的文獻多是制度結構的問 題,因此筆者以制度稱之(Vogel, 2006: 29-34),事實上 Vogel 行文中的結構與制度多 為同義詞。與「結構危機學派」相對立的是「政 策失敗學派」(Policy Failure School),也是 Vogel 較為認同的學派。 爆發後連續產出三個錯誤的金融政 策,首先是日本央行過度反應的急遽 拉升利率,導致經濟硬著路拉開通貨 緊縮序幕;其次是大藏省堅持不利用 國家預算成立資產處理機構和銀行退 場制度,而是沿襲過去行之有年的「避 免倒閉」(too big to fail)抒困策略協助 問題銀行隱瞞壞帳、引導銀行間資金 互助,讓壞帳問題不斷擴大;最後是 大藏省和日本央行錯估形勢的分別在 1997 年增稅、2000 年提升利率, 扼殺 了復甦機會。金融官僚在錯誤時刻(泡 沫危機)堅守過去的政策信念(大藏省 信奉預算平衡與行政指導、日本央行 堅持價格穩定),釀成賡緒不斷的經濟 波折(Vogel, 2006: 23-27, 45-50)。

Vogel 呼應著多樣性資本主義的 理解,指出任何國家體制並存著優勢 與缺陷,為了保持系統長治久安行動 者必然會催生出許多保持優勢、彌補 缺陷的補充性安排,所以僅擷取國家 模式中特定斷面而推論整套制度系絡 缺乏效率的論述,遠不如決策失誤的 看法具說服力。可是 Vogel 仍然必須面 對兩個質疑:首先,在經濟成長期間 表現傑出的官僚,何以在1990年代「突 然」失去領航能力而接連誤判形勢鑄 成大錯?當發展型國家理論者耗費許 多心力在理解優質官僚決策背後的產 出機制 (Wade, 2004, Woo-Cumings, 1999), Vogel 勢必得指出決策失誤的根 源;其次,泡沫危機在 Vogel 的討論中 無疑是日本模式的最大挑戰, 亦是促 進轉型的動力來源,然而作者似乎將 如此重要的事件視為外生衝擊,而沒 有探究泡沫危機與日本模式的內生性 因果關係,也就無法得知為何泡沫危 機是在1990年爆發於日本,而非其他 時間或國家?

3. 高柏:「輕監控/強協調」的制度矛盾與布列頓森林體系瓦解

Amyx和Vogel針對日本模式和金融危機因果關係的討論有欠完整,筆者認為這反映了兩位作者致力回答日本制度變遷的旨趣(也就是下一部份的主題),相對而言,高柏的研究幾乎完全處理日本模式與金融危機的內生關係,使其研究對於本主題提供了較完整且充分說服力的論證。

高柏的研究策略是確立日本經濟 奇蹟與泡沫危機的共同特徵,同時闡 述此共同特徵與日本模式的因果關 係,邏輯一致的建立從奇蹟到危機的 整體性解釋(Gao, 2001: 6-7)。具體而 論,泡沫經濟時狂熱的金融投機、銀 行超貸與資產爆脹,一如經濟奇蹟中 企業勇於投資,基本條件都在於經濟 體中的資本穩定(或超額)供應,鼓勵企 業或銀行採取過度競爭的經營策略, 追求市場佔有率而非利潤率,漠視風 險而大舉借貸。這樣的企業治理乃是 鑲嵌於「協調體制」,亦即日本政府為 了克服戰後重建所面臨的市場失靈, 例如資本稀缺與創新精神缺乏,而利 用前文所提及的金融體制與產業政策 承擔企業投資風險(Gao, 2001: 70-72, 183-189, 193-197) •

毫無疑問,這種風險「集體化、 社會化、國家化」的體制誘使企業與 銀行放棄審慎經營而充滿道德危機, 容易導致經濟過熱。於是日本政府採 取了一組金融政策組合來維持穩定: 以國際收支作為判斷景氣狀態的貨幣 數,在經濟衰退期間採取寬鬆的貨幣 政策,提供產業資本以促進出口,直到景氣過熱國內物價上升,導致出口衰退和國際收支逆差,政府隨即採緊縮性貨幣政策(提高利率),抑制銀行信貸而迅速冷卻經濟甚至進入衰退,然後重啟寬鬆貨幣政策,週而復始(Gao, 2001: 30-31, 72-76)。

總而言之,日本模式中監控道德 危機的機制既非企業董事會、亦不在 於「主銀行」,而完全集中於貨幣主管 機關的總體調節。該模式有效運作的 前提在於二戰後依據固定匯率、資本 管制與自由貿易三大原則所建立的 「布列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固定匯率讓國際收支變化成 為景氣循環的領先指標,資本管制則 使總體政策得以發揮作用。不過當布 列頓體系在 1970 年代崩潰,浮動匯 率、金融自由化與金融創新席捲全球 (Gao, 2001: 38-39)。據此,高柏將布列 頓體系的瓦解視為引導日本模式走向 危機的中介變項,主張 1980 年代的日 本無力阻擋資本跨國流動和企業「金 融煉金術」,又擔憂匯率調整影響出 口,於是陷入貨幣政策失效的困境。 1970 年代末期金融官僚為穩定匯率大 舉進出公開市場操作,已令日本產生 泡沫端倪。1985 年「廣場協議」後日 圓被迫大幅升值,金融主管機關為刺 激出口再度啟動寬鬆貨幣政策,也注 定泡沫危機的來臨(Gao, 2001: 159-160, 176-177) •

(二)日本模式的制度變遷

這個問題範疇表面上涉及如何解 釋日本超過十年的改革困境,亦即遲 緩的政策惰性,本質上則關連著如何 恰當的理解日本制度變遷。如同後文 所呈現,三位作者對此問題的解答其 實反映了彼此對制度的不同認知,以 及歧異的制度分析途徑。

1. 高柏的解釋:舊制度與新結構

誠如前文所介紹,高柏的制度分 析展現了涵蓋自宏觀資本結構/國際制 度--國家體制/政府政策--企業治理/ 經營策略三大層次的整體性論述,這 樣的視野充分顯示其身為社會學家的 嚴謹學科訓練,以及承襲自 Karl Polanyi 的宏觀歷史分析(Gao, 2001: 9)。承此,高柏很自然的將制度理解為 特定歷史結構的集合性體現,而將制 度危機歸咎於結構變遷。於是種種曾 經高度有效的「成長機制」9通通在布 列頓體系瓦解(全球化浪潮)之下失 效,此時展開的改革往往會延遲經濟 復甦,因為舊的成長機制已深受摧 殘,但新的成長機制尚未竟全功,作 者主張此即為1990年代日本停滯的奧 秘。例如當日本的銀行體系放棄過往 「護送艦隊」責任而強調審慎信貸 時,產生的效果卻是廣抽企業銀根、 投資下降; 又或是整體就業制度朝更 彈性的雇傭體制傾斜,反而惡化消費 者信心,加大衰退。於是,金融全球 化和激進改革反而是惡化衰退、延長 危機的主因(Gao, 2001:271-274, 264-265) •

如此一來,1990 年代日本模式的 變遷就被高柏視為因應新歷史結構, 開展漫長重建的除舊階段。這種將制 度變遷視為結構壓力驅動的決定論看 法,無法說明何以當歐陸或東亞等同 樣具有「協調制度特徵」¹⁰的國家在面 對金融全球化的壓力,不會如日本般 陷入顯著的改革停滯。況且,若如高 柏所言制度轉變與結構變化具有一定 程度的共變效果(以危機的形式促成變 遷),則日本模式應該至少朝「強監控 體制 |轉變,但事實上顯然並非如此。 從後文 Amyx 和 Vogel 所勾勒出日本 1980 年代末期至 2000 年的政策過程, 清楚呈現了行為者層次的互動如何導 致獨特的日本改革模式。高柏的分析 經常觸及具體的政治過程,但是方法 論上的限制以及研究旨趣,使他逕自 將 1990 年代的實存現象視為前期的遺 緒,而沒有更細膩的處理。就此而言, Amyx 和 Vogel 在這個問題範疇上提供 更完整的論證。

2. Amyx 的解釋:管制網絡的穩定度

依循網絡化制度的視野, Amyx 稱 1990 年代的日本金融管制網絡為「網 絡癱瘓」,關鍵在於自民黨與大藏省之 間制度化同盟關係的崩潰。Amyx 強調 網絡化模式的「核心—樞紐」關係必 須高度穩定,如此才能確保該網絡的 資訊倡達、組織自主性與政策實踐效 果,一旦對外聯絡的樞紐毀棄,則網 絡化模式會陷入溝通無門的混亂中。 自民黨長久的一黨獨大扮演了穩定功 能,讓金融官僚能夠相對獨立的擬定 政策,不過在1990年代日本政黨政治 進入政黨輪替與聯合政府階段,政治 干預讓網絡化模式高度動盪,過去追 求專業的決策官僚如今致力於部會權 力與生存的鬥爭,偏離發展型模式 (Amyx, 2004: 32-34, 258-260) •

⁹ 如發展型產業政策、主銀行、系列企業、全體就業與永業制。

¹⁰ 或以高柏的看法,具道德危機傾向的體制

在 1995 年爆發的第一次金融危 機—「住專危機:住宅專門金融公司 倒閉」(Jusen crisis), 迫使政府動用國 庫成立金融重建基金,象徵大藏省的 行政指導失效,針對大藏省的批評聲 浪排山倒海而來。少了失去政權的自 民黨庇蔭,金融官僚只好利用網絡化 模式拖延結構性改革,包括隱瞞銀行 壞帳的真實資訊、抑制官僚內部的改 革力量、迫使體質健全的銀行缺乏審 慎監控機制下便概括承受債務。即便 到了金融風暴勢不可檔,必須另起獨 立金融監理機關-金融監理委員會 (FSA),大藏省內的銀行與證券局官員 反而因為感到威脅, 而變本加厲的透 過網絡化模式滲透管制權力,例如參 與研擬金監會組織法草案確保大藏省 的統御範圍、主導大藏省出身的高階 文官任職金監會,或是利用網絡化模 式 壟 斷 銀 行 資 訊 (Amyx, 2004: 163-193) •

網絡化模式一再圈限改革幅度, 釀成慘痛的「失落十年」,終於凝聚日 本全國重建金融體系的革新偏好,不 過系統性轉型的可能性依舊受到網絡 化模式兩個制度遺緒:主銀行系統、 金融界人事管理系統的箝制,阻止了 更具前瞻的系統性革新(Amyx, 2004: 235-247, 254-255)。

3. Vogel 的解釋:多樣性資本主義下 的日本轉型

Vogel 將日本轉型過程中曖昧不明、保守折衷的「惰性路徑」視為分析起點,提出簡潔卻顛覆性的答案:「日本的遲緩制度變遷反映了日本不想改變的社會共識——不願以犧牲穩定為代價換取高度競爭但脆弱的秩序、

不願為了改革體制無效率問題而導致 嚴重失業或社會動盪(Vogel, 2006: 44-45)。」這樣的看法根基在三個理 由:首先 Vogel 已在前文論證日本停滯 主因在於政策失誤而非體制失效,準 此而論任何「結構改革」都不全然是 針對日本困境進行的理性反應,亦未 必會帶來經濟復甦,也就無法凝聚足 夠的支持者(Vogel, 2006: 39); 其次, 缺乏足夠證據顯示西方/美國模式絕對 優於日本模式; 最後, 多樣性資本主 義指出各國皆掌握既有「國家模式」 的「比較制度優勢」,因此制度變遷的 本益計算就不僅是改革可能獲致的功 效,還包括毀棄舊制度而失去的優 勢。日本模式特徵--經濟平等、低犯 罪率、教育普及、公共衛生, 共同促 成兩大價值:社會團結與穩定。這也 就讓改革時常面臨新目標與舊價值的 衝突(Vogel, 2006: 207-213)。

Vogel 依循著多樣性資本主義的 邏輯主張任何體制,不論是協調性市 場體制或自由市場體制,都具備相當 的生產力,因此沒有任何顯著證據支 持特定體制的優越性,所以任何「效 率導向」的改革本質上更可能是反應 著政經社會意識型態的轉變(Vogel, 2006: 211)。基於此,唯有徹底瞭解日 本模式中的「產業偏好」(industry preference) ¹¹,才能更恰當的理解日本 轉型(Vogel, 2006: 21)。Vogel 特別重視

¹¹ Vogel 用「產業偏好」來指涉所有行為者對於 特定產業秩序的偏好集合,也就是國家(政客 與官僚)、企業與社會各自對於產業所涉及一 切體制關係的價值性/應然性想像,例如產業 內勞資關係、資本關係、政企關係、企業間關 係,不同行為者在策略互動後會形成一個總體 性的產業秩序偏好,依循這個產業制序偏好將 會形成眾多補充性的微觀制度,在歷史發展中 微觀制度會不斷強化這樣的偏好。

日本模式的「微觀制度」: 永業制、主銀行系統、系列式企業治理、生產供應鍊。這四項微觀制度體現了產業偏好(勞資的忠誠關係、銀行對企業的穩定支持、企業共同體、上中下游分包的合作),行為者對於四項微觀體制的偏好轉變將決定改革的範圍,因此對於制度變遷具有決定性的影響(Vogel, 2006: 8-9)。

Vogel 檢驗了不同行為者的改革 偏好後,替日本的審慎變革提供了更 完全之圖像。當官僚試圖鬆綁管制, 提供企業更自由競爭的市場體制,企 業與消費者的反應卻是以保存原有的 產業偏好為前提,進行微幅的調整12。 總的說來, Vogel 認為日本模式已經轉 型為更具選擇彈性、更多元也更開放 的體系,企業如今具有更自由的空間 選擇適當的金融、生產與勞資體制 (Vogel, 2006: 220)。不過,更值得關注 的是,日本轉型仍然維持固有的「呼 籲策略」(Voice)勝於「出走策略」 (Exit),企業、勞工與銀行傾向利用制 度性溝通協調來解決嶄新挑戰,就此 而言,日本模式未曾徹底轉型,而是 一種延續過往的「固定模式化創新」 (Patterned Innovation), 1990 年代後的 日本應作如是觀(Vogel, 2006: 224)。

三 總結及啟發:金融制度研究與理論選擇

本文嘗試引領三本書針對相同問題進行對話,並且對比個別解釋的優劣之處,最後希望以一個問題作為整篇文章的總結:「何以對於同樣的現象—日本金融問題,三位作者會得出截然不同的解釋?」

本文的初探性解答是,三位作者 採取不同角度理解制度及制度效果, 也就影響了他們對於相同問題的解 答。就方法論的角度區分,Amyx 相對 偏向個體主義,重視個體行動者的能 動性,從人際互動構成的非正式關係 界定制度。另一方面,高柏則是偏向 總體主義,強調外在環境—結構的作 用,因此將制度理解為一整套因應特 定歷史結構需要所形塑的安排。Vogel 的立場接近於總體主義,也將制度看 做服膺特定情境的整體架構,但是強 調個體對既有制度的利害算計與認 知,因此稍稍擺脫了決定論的問題, 雖然這是以局部性的模稜兩可為代 價;若從制度的因果作用來區分, Amyx 和 Vogel 都認為制度是一個關鍵 的主要獨立變項,但高柏強調整體結 構的論述,這也使得其他國內制度變 項相對缺乏獨立地位。

於是,當三位作者共同面對本書 評在一開始點出的問題:「如何解釋日 本金融危機?又該如何理解日本的金 融制度變遷?」高柏理所當然會以「博 藍尼式」的視野,凸顯宏觀國際資本 結構如何衝擊國內制度效用;Amyx 則 順理成章的依循理性選擇邏輯,呈現 官僚政治、結盟與衝突、改革分配性 效果所主導的政治過程;嘗試化解「結

¹² 例如永業制的改革中,企業試圖以企業集團內部的網絡系統或資訊監控技術來提升勞動力素質,以及透過集團內公司間的職務調整來降低工資成本,而不傾向大規模裁員;金融改立是最具有成效的是更新會計準則,讓銀行公式。 業更難隱藏壞帳,不過修訂過程受到自民黨議員、保險及銀行公司的阻撓。除此之外,新的金融監理架構還是沿用傳統的官僚指至金證式,雖然現今的管制權力從大藏省移轉至金證、雖然現今的管制權力從大藏省移轉至監會之手。金融業務整合催生金控公司,重組產業集團並促進集團內的併購(Vogel, 2006: 84-85, 88-91, 216-219)。

構—行動」衝突的 Vogel 便以整合「權力、利益、認同」的複雜架構,用「動態的路徑依賴」觀點重新理解日本¹³。

總而言之,這三本書共同揭露了 金融問題必然涉及的三個面向,提醒 未來任何決策者或社會科學研究者在 處理金融問題時,至少必須理解可能 存在三個層次的原因,而不是一廂情 願或人云亦云,方能對症下藥,以及 創造更有知識貢獻的討論。

參考文獻

- Eatwell, John and Lance Taylor. 2000. Global Finance at Risk. New York: The New Press.
- Hall, Peter A., and David Soskice (eds).

 2001.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13 以 Vogel 的話,這叫做「固定模式化創新」 (Patterned Innovation), Comparative Advantage, d by Peter A. Hall and David Soskice.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ester, W. Carl. 1996 "American and Japanese Corporate Governance: Convergence to Best Practice?" in Berger, Suzanne and Ronald Dore (ed.) *National Diversity and Global Capit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p. 107-137
- Stiglitz, Joseph E. 2002.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W.W. Norton & Company.
- Vogel, K. Steven. 1996. Freer Markets,
 More Rules: Regulatory Reform in
 Advanced Industrial Countri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Wade, Robert. 2004(2nd). Governing the Market: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y the author "Creating Capitalis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Williamson, John. 2004. "A Short History of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Paper commissioned by Fundación CIDOB for a conference "From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towards a new Global Governance." Barcelona, September 24–25, 2004.
- Woo-Cumings, Meredith(ed.),1999.*The Developmental State*. Ithaca:

¹⁴ 關於這一點,我必須誠摯的感謝其中一位匿名審查人給予的參考意見,在撰文過程中我只希望引導讀者進入三本書內,無意比較其優劣。審查人協助我提出更進一步的申論,在此致謝。

Cornell University.

社會運動與革命:理論更新和中國經驗

張迪皓 / 台大政治所政論組碩士生

在任何統治形式下都在所難免地有不服從存在。從前資本主義社會裡的俠勇、偷竊、毀謗,到將整個權力結構翻轉的革命,直至現今我們所理解的「現代」社會運動等等,都是各種不同的類型的不服從型式。而西方社會科學理論典範也據此提出相應的理論框架,企圖去解釋或描繪,如 James C. Scott 的《弱者的武器》、Theda Skocpol 的《國家與社會革命》等。在這些理論框架中被應用最廣,無非是由 Charles Tilly、Doug McAdam、Sidney Tarrow等人所發展的政治過程論(Political Process Theory)。

政治過程論定義社會運動為「以潛在社會網絡和使人產生共鳴的集體行動框架為基礎,能發展出對強大對手保持持續挑戰力的鬥爭政治事件」(引自Sidney Tarrow,2005:3)。其是在現代民族國家與若干如交通、郵電等發明下的獨特時代產物,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首出現於歐洲。然而,政治過程論的運用並不只侷限在解讀西方民主化後的社會運動,如學者 Athony Oberschall 就曾用該理論框架來詮釋九零年代東歐的民主化。

到底社會運動又要什麼因素才會出現的呢? McAdam 在其 1983 年所發表的經典文獻中指出,社 會運動是在總體社會與經濟變遷中,因政治機會結 構擴張與組織網絡的演進,促使參與者認知解放, 並在上述各因素的交錯影響下逐漸萌芽。

而趙鼎新這本《社會運動與革命—理論更新和中國經驗》是在政治過程論作為研究社會運動的典範霸權下的一種對西方的反抗。全書分為四個部份。趙鼎新先在第一到十二章,將其他社會運動理論重新檢視,用**結構、變遷、話語**三個層次如手術刀般切割這些理論,化整為零來討論,挖掘之前的不足和對自己的啟發。



書名:社會運動與革 命:理論更新和中國經 驗

作者:趙鼎新

出版者:巨流出版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日期:2007.11

頁數:434 pages

ISBN: 978-957-732-284-5

在三、四章, 趙鼎新討論變遷對 社會運動的影響,變遷指的是舉凡現 代化、自然災害、人口變遷等所造成 的社會變化。五到十章則從宏觀到微 觀討論結構,結構有兩個層次-國家 和社會,國家指的是包括國體、政體 與正當性來源;社會則指獨立於國家 之外的各種中層組織發達程度與性 質,並包含如資本家-工人、地主-佃農等人與人在經濟活動中建立起來 的各種關係。並從如搭便車理論等其 他理論框架,討論在國家、社會結構 下行動者的各種行為模式。最後在十 一、十二章討論話語,話語是指行動 所鑲嵌的文化脈絡,與其所衍伸出的 個體行動策略,其中並包含運動者所 懷抱的意識型態。

在第十三章前半,趙鼎新將這三個概念模組整合起來,並提出自己的理論框架—國家社會關係。並在第十三章後半由三個中國的經驗個案—文革、中國的環保運動、萬曆民變來看該理論框架如何實作。

個體作為社會運動的主體

政治過程論多將人視為利益理性 判斷的個體,強調社會運動是在個體 對於政治機會結構的擴張或緊縮,所 做出的反饋。政治機會結構簡約地 說,指的是體制內行為者和運動者間 的互動,主要是菁英間的分裂與合縱 1。因此,在這種論述下的運動者,是

由於在社會運動的研究領域裡,對何為政治機會缺乏共識,Doug McAdam藉由比較其他理論家的觀點,歸納出政治機會有幾點共通點:第一,體制內的政治系統開放或封閉與否。第二,支撐政體的精英間的聯盟穩定與否。第三,是否出現菁英的聯盟。第四,國家對鎮壓的能力與偏好。詳請見 Doug

個面臨政治環境變遷的受體,理性且 被動。

然而,趙鼎新在第三章先援引早期社會心理學的研究途徑,從Leborn、Blumer、Turner到Smelser的加值理論,認為這些研究多將運動者視為非理性的,行動有很大部分主要是由情感所導引。但後續所發展的理性選擇理論,卻反將個體行為視為理性選擇理論,卻反將個體行為視為理性。對於趙鼎新而言,兩者間的差異必須放進不同的政治環境來理解。

McAdam(1996), "Conceptual origins, current problems, future direction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pp.23-40

再者,趙鼎新認為承繼理性選擇 論調的政治過程論,忽視了社會結構 對個體的框囿,而社會結構對於個體 不僅只是種機會而已。相反地,每個 人都要上學、繳稅,在社會結構下生 活。個體在社會結構中也接受訊息個 甚至面臨到資訊不對稱的情境。個體 與社會結構,既有主觀認知也有客觀 接受的成分。

小結上述,趙鼎新所揭示的社會 運動,不僅僅是一個個體面臨機會而 行動的過程而已,而是擴大到運動者 主觀地感知,並是一個和國家、社會 結構互動、彼此互構的過程。

鑲嵌在脈絡中的社會運動

趙鼎新在第二、九章指出政治過程論用政治機會結構窄化了國家,忽略了國家體制對社會運動的牽制。到第十三章他歸結全書,提出他的觀點一社會運動必須放到其所發生的社會脈絡下來理解,尤其是其所屬的國家與社會關係。

在持續民主化的國家,如中國, 集體行動的意涵與可能的發展、影響,都與西方民主國家大相逕庭,因 此趙鼎新將政治社會學的視角納入他

在國家性質與社會組織之間的互動,則是指國家的正當性來源與其體制化社會衝突的能力。在此更可看出民主化程度差異對社會運動的影響,一個民主國家相較於非民主國家,不但正當性來源不同,且體制化社會衝突的管道與能量都要來得高。

總結而論,趙鼎新的這種視角, 是將運動視為一個整體,它發生 在其鑲嵌的脈絡中,欲理解它就要先 從脈絡來理解。而脈絡的內涵則是要 由政治社會學的方式,將其區分為國 家、社會與二者間的互動來檢視。由 此建構一社會運動全貌。

理論運用與個案

趙鼎新在前言裡寫到,自身的理 論關懷是現階段的中國社會運動、 中國政府是否能夠逐漸走向民主人 體制化社會衝突,使不至於發生生如 力學運般的悲劇。中國和西方先進 主國家無論在國家性質和社會人 主國家無論在國家性質和社會人 主國家無論在國家性質和社會人 是一 是一 體制化,幾乎已無延燒至革命的可能。

² 抗爭週期 (protest cycle) 是指「與社會體制對立的矛盾深化階段:集體行動從動員較好向動員較差的部門擴散;鬥爭形式上出現快速革新;新的或轉變了的集體行動框架被創造出來;有組織和無組織的社會參與相結合;信息流關係增強;挑戰者與當權者相互作用。」引自 Sidney Tarrow, 吳慶宏譯 (2005),《運動中的力量:社會運動與鬥爭政治》,南京:譯林,頁 190。

民主運動的帶動下興起,不但和後工 業社會扯不上關係,且在組織模式 策略、運動目標與認同等都是民主 動下的一個支流,甚至反而和「舊」 社會運動相似。這部份回應了趙鼎新 在第一章所云,不應由理論導引解 (interpretation)與解釋 (explanation),而是要依據個案的特 質和研究者的偏好,來選擇適合的理 論框架。

參考書目

Doug McAdam(1983),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The Political Process Model,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p3

Doug McAdam (1996), "Conceptual origins, current problems, future direction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pp.23-40

Alberto Mellucci (1980), "The New Social Movement: A Theoretical Approach",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19:199-226

Sidney Tarrow, 吳慶宏譯(2005), 《運動中的力量:社會運動與鬥爭政治》, 南京:譯林。

Alain Touraine,舒詩偉、許甘霖、蔡 宜剛譯(2002),《行動者的歸來》。台 北:麥田,第六章。

³ 新社會運動係指自七零年代歐洲學界反應 後工業社會對社會運動的影響,所發展出的概念。其認為一些如環保、和平、婦女運動已不 同於之前由如階級、種族等所構成的社會運 動,不再侷限於政治、經濟利益的鬥爭,進而 轉向根深蒂固的文化鬥爭。詳請見 Alain

Touraine (2002),《行動者的歸來》。台北:麥田,第六章。Alberto Mellucci(1980), "The New Social Movement: A Theoretical Approach",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19:199-226

何明修(2004),〈當本土社會運動遇 到西方新社會運動理論:以台灣的反 核運動為例〉,教育與社會研究,7: 69-97。

趙鼎新(2007),《社會運動與革命:理論更新和中國經驗》,台北:巨流。

【政治科學季評第23期徵稿啟示】

為能對當代政治學知識發展與時俱進,提升並促進學術之反省對話,推動全國政治學相關系所之學術參與及交流,本刊公開徵求對政治科學相關學術著作之「書評」與「書目」,期許引領暨提升學術研究之風氣。

投稿須知

- 徵稿對象: 全國政治科學相關系所師生
- 稿件內容:
 - (一) 短篇書評:針對政治科學相關中外文學術著作之評論(其中至少應有二分之一以上篇幅作為內容引介),約 2000 至 2500 字。
 - (二)長篇書評:針對三至六本政治科學相關中外學術著作之綜合評論,約 5000 至 8000 字。
 - (三) 書目:針對政治科學相關學術著作之介紹,約1000至1500字。
 - (四) 讀者回應:對前期刊登書評之回應,約1000至1500字。
- 截稿日期: 2009 年八月一日以前。
- 稿件筆潤:
 - (一) 短篇書評經審核後採用者,每篇新台幣壹仟貳佰圓整。
 - (二) 長篇書評經審核後採用者,每篇新台幣參仟圓整。
 - (三) 書目經審核後採用者,每篇新台幣柒佰圓整。
 - (四) 讀者回應經審核後採用者,每篇新台幣伍佰圓整。

■ 注意事項

- (一) 註釋及參考書目,請參考《政治科學論叢》體例。
- (二) 請勿以考試用書、教科書、會議論文作為投稿內容。
- (三) 稿件內容必須至少三分之一篇幅為評論。
- (四) 本刊物嚴禁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規範的稿件,違者除稿件一率不予 錄用外,並將以本編輯委員會名義寄發通知信函給投稿人所屬單位。
- (五)編輯委員會以尊重稿件內容為原則,力求避免修改,惟保留此項權 利。
- 本刊物嚴禁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規範的稿件。編輯委員會以尊重稿件內容為原則,力求避免修改,惟保留此項權利。
- 投稿暨聯絡方式:
 - (一) 電子郵件: PoliSciReview@ntu.edu.tw
 - (二) 一般郵寄:台北市中正區(100)徐州路21號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暨研究所 政治科學季評編輯委員會

The Search for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洪健庭 / PhD student, Center on Philanthropy, Indiana University

Since 1980's,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are gradually recognizing the social impact of social entrepreneur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to the decision making in the public policy process.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can be defined as "an effort by an individual, group, network, organization or alliance of organizations that seeks sustainable, large-scale change through pattern-breaking ideas in what governments, nonprofits, and businesses do to address significant social problems ¹." (p.12) ² and one well-known example from recent years is most notably Muhammad Yunus. In the 2008 new book, the author Paul C. Light, professor of school of public service at New York University, discussed the relevant issues in the field of nonprofit management nowadays.

His basic idea in this book is that he wants to clarify the basic definition, activity, strategies and assumptions about the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past we usually only think about the issue of innovation process, either in the public sector(central or local government) or in the business sector (mainly global private enterprises or small-medium firms). Nonetheless, it is also quite obvious that the social sector, which are contained the altruistic elements of



書名:The Search for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作者: Paul C. Light

出版者: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出版地: Washington, D.C.

日期:2008

頁數: 295 pages

ISBN: 978-0-8157-5210-3

¹ This definition is mainly from his original paper in 2005 prepared for the 34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Association for Research on Nonprofit Organization and Voluntary Action (ARNOVA), which is the most influential association that focuses on the study of the third sector, and then debating in Fall 2006 issue in *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

² Other scholars such as Jams E. Austin from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used the similar definition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s "an innovative, social value-creating activity that can occur within or across the nonprofit, business or government sector." in Jane Wei-Skillern, (ed.) 2007.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Social Sector*. Thousand Oaks, California: Sage. P.4.

charity and philanthropy, can be very innovative and solve a lot of social ills than the public officials. As J. Gregory Dees said, "Far too many people still think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in terms of nonprofits generating earned income. This is a dangerously narrow view. It shifts attention away from the ultimate goal of any self-respecting social entrepreneur, namely social impact, and focuses it on one particular method of generating resources. Earned income is only a means to a social end, and it is not always the best means." (p.5). In a clear sense, we need to consider a new type of nonprofit ideology, which is to say that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have to learn how to manage and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the running cost and long-term/benefit/to/pursue/the/sustaina ble human resource and social capital to change the world.

This book showed its values in his own 2001 and 2006 survey of 131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250 senior executives such as the famous American Red Cross, CARE USA, Doctors Without Borders, Watch. YMCA. **OMB** Children's Museum of Indianapolis, New York Foundation for the Arts, etc. and explain his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ixed research method, which was basically to interview with the leaders of different organizations by a series of questions and then figure out if the stated difference and variety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t the 0.05 confidence level, which means that one can have at least 95 percent confidence that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is not random; as a result, their responses are sorted into three groups: highly entrepreneurial, moderately entrepreneurial and not so entrepreneurial. This resulted in th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o examine and compare the groups' thought and impact.

First, Light's assumptions about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fall into four kinds ofbroad components: entrepreneurs, ideas, opportunities and organizations. In each dimension he made ten null hypotheses for theory testing (pp.22-27). For instance, in the entrepreneurial dimension, he asked the reasoning question like this: social entrepreneurs work alone (Hypothesis 1-1), they take greater risks (1-6), they share "one best strategy" for success (1-10). Another example from the idea dimension goes as follows: socially entrepreneurial ideas focus on programs, not process (2-6), these ideas produce immediate results (2-10). Then he used the empirical interviewing data to test if the result support or reject the research hypotheses.

Secondly, the result showed different responses comparing traditional and entrepreneurial organizations of his case studies in American society (p.40). On the one hand, the former still fight and divide with hierarchy, impose a single vision through centralization. highly specialize and formalize the old measures, control messages from the top and rules and extrapolate from past experience. On the other hand, by contrast, the latter try to define the and ambiguity, search share information, engage all participants through flat hierarchy, encourage local ownership of ideas. Clearly, we se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categories and that is to say modern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gets more involved into the new experiment and de-centralization strategy into the nonprofit management process.

Third, the main contribution of this new book is that the writer's argument of logic chain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It goes from existing equilibrium to inside transformation, and then comes the strategy to new equilibrium in the whole society (p.54). In other words, he induces ten levels of analysis from the hidden to the visible in these new social enterprises, which are action, alertness, agility, skills, assets, core values, needs and wants, life experiences, traits and basic human capacity (p.100). Nevertheless, we have to keep in mind that every social organization has its limit just like the nature of human beings in both sides: the bright side and the dark side. In the bright side of entrepreneurship, people learn how to pursue the organizational mission by using the intelligent finance skills. In the dark side, however, the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issue still cannot be neglected by the general

public, especially the donors and the authority concerned in the government agency.

To conclude and contrast Taiwan's experience in an era of sector-blurring, I provide three policy suggestions: first, it does not make any sense to put too many constraints on the nonprofits from being strategically financial management, just because they are simply labeled in terms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Meanwhile, when the nonprofits try to transform themselves into social enterprises, they must be very careful not to fall into "mission displacement". Most of the leaders, staff or volunteers that I interviewed with are often telling me the same story: social welfare organizations should always follow the rule of non-distribution constraint (NDC) to achieve the mission and vision. However, as a matter of fact, they put themselves into a dangerous there are dilemma that so poor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holistic management skill while they still wish to sustain or keep the organizations survive. It is appropriate enough to just keep a self-regulation model of internal accountability. Some of Taiwan's central government such as Ministry of Interior Affairs right now has provided the grants to social welfare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they have to be very cautious not becoming to "control" them, but encouraging them to be more innovative.

Moreover, when it comes to public trust issue, the nonprofit leaders must have the courage to public their annual financial report to the citizens with a more readable and easier style. The more transparent the nonprofits are, the more mutual trust they will gain. But the point here is not to confuse the public with a list of complicated numbers and cost-benefit analysis. The nonprofits need to learn how to truly communicate with different people and show their efforts as a kind of cause-related marketing. It is a good beginning that Taiwan Self-Regulation Alliance right now pronounced the approved 16 fund-raising projects that need to be more accessible to the general public, but we anticipate more and more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join in the self-regulation process³.

Finally, in terms of educational application, the writer shed light on the conclusion that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is evolving rapidly both as a concept and as a cause (p.214). As a concept,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has captured interest across a wide range of academic disciplines. Consequently, it is necessary

for different researchers in varied areas to discuss more social issues such as poverty, hunger, disease and unemployment. As a cause,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is attracting a new generation of change agents who have the core characteristics needed for sustainable change. (p.215) Furthermore, this change can be reached as earlier as possible. Over 30 univers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have already run the programs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offering research centers, providing certificates and master's degrees, including Indiana, Syracuse, Harvard Stanford, etc. After all, positively look forward to seeing the education development of newly social entrepreneurs in Taiwan and other countries to build a strong civil society for the whole human beings as the author Light pointed out in this book that the characteristic of social entrepreneur is the "perseverance against an array of obstacles."

22

³ The Alliance was formally established on October 2005 with 63 members who made the pledge of self-regulation and agreed to achieve the goals of "fundraising accountability, financial transparency, service efficiency and organizational governance." Now the Alliance had 74 organizational members, all outstanding NPO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fields of social welfare, culture, education and health. For more financial information about the 16 fund-raising projects, please go to their website at http://www.npoalliance.org.tw.

中國怎麼想?(What Does China Think?)

張鈞凱 / 台大政治所政論組碩士生

本書作者馬克·里歐納德(Mark Leonard)目前是「歐洲外交關係協會」(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執行主任。 故他對英國的外交政策有舉足輕重的影響。他的第一本著作《歐洲為什麼將主導廿一世紀》(Why Europe Run the 21st Century)暢銷全球。他曾以中國社會科學院訪問學人的身分住在北京一段日子,本書正是他在那段時間內對中國與其知識分子的觀察。

一、從知識分子看當代中國

以知識分子來看當代中國思想與發展過程,本書絕非首創。六四學運的領導人物之一王超華,在2003 年就曾以英文完成《One China, Many Paths》¹,全書的焦點集中在九○年代。首先是對四位中國的學者訪談,描繪出當時的思想風貌;其次是探討九○年代以降經濟變革的特徵與後果;再者,透過特定的文章討論了過去十年社會因為轉型所產生的敏感問題;最後,以圓桌論壇的方式反思了後六四的中國民主與政治。

本書與《歧路中國》有其異與同之處。首先,本書的寫作手法是縱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政治、經濟與外交上的變革,但焦點是擺在「現在進行式」的中國。如果說《歧路中國》是當時對未來的展望,那麼本書某程度上可視為是《歧路中國》觀點的審視。再者,本書作者把當代中國在政治、觀點的審視。再者,本書作者把當代中國在政治、將知識分子分成對現今政策的支持者與反對者,這樣的處理手法就與《歧路中國》不一樣。

本書提及的知識分子都是作者親身接觸過的,而且確實是中國發展路線中參與論戰的人。舉例言之,在經濟發展的路線上,張維迎的「雙軌價格改革」符合了主張改革開放的政府高層;但隨著經濟發展,社會問題愈形嚴重,「新左派」的路線正在崛起代表人物有汪暉、崔之元等人,這派主張中國的發展必須更均衡,符合了當下胡溫的政策路

書名:中國怎麼想? (What does China think)

作者: Mark Leonard

譯者:林雨蒨

出版者:行人出版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日期:2008.11

頁數: 190 pages

ISBN: 978-986-83442-

9-7

中 意 怎 想 ?

本書有正體中文版:王超華主編,《歧路中國——當代中國 頂尖知識份子探索歧路中的中國》(2004,臺北:聯經)。

二、「圍城世界」

自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發展路線仍是不斷在調整。在迅息萬變的情勢,與知識分子主張的路線之爭中, 作者企圖理出一條「當下」的中國新 思維。

首先談經濟方面。過去經濟路線 的軍師是主張不斷開放的張維迎,他 認為計畫經濟像馬,而中國是一個僅 靠馬幹活的村莊,雖然長老們發現代 表市場經濟的斑馬比較好,但村民的 想法與態度早已根深蒂固、改變不 了,於是長老們在馬身上塗上一條條 的斑馬紋。張維迎的「斑馬喻」,就 是改革開放初期的寫照,一種以沿海 為代表向外開放的「珠江資本主 義」。但近來的狀況卻是,中國政府 受到新左派的影響,逐漸證明中國如 何能在不犧牲工資、條件與社會保護 之下,仍然能在市場環境中生存,作 者稱這種發展模式為「黃河資本主 義」2,此模式正在取代原來的「珠江 資本主義 」。

其次是政治方面。曾經發表〈民 主是個好東西〉一文的俞可平,是中 國政治改革的提倡者,他擔任中央編譯局副局長期間,在各鄉鎮推動漸進式民主。但政治改革派必須在中國最偏僻的鄉村進行實驗,顯示出政治改革在中國是一件慘澹經營之事。

在國際互動方面。美國提倡的是「扁平世界」(flat world),歐洲倡導的是「多邊主義」,但中國信仰的是「綜合國力」。對中國來說,經濟力的「陰」須與軍事、政治力的「陽」相互平衡。2006年中國喊出的「中國夢」⁵就是信仰「綜合國力」的直接表現。

黄河資本主義、商議式專制,再 加上綜合國力,中國已經為世界其他 地方創造出一個可供依循、且非西方

² 這個模式最先在河南南街被實現。因為河南地處黃河河岸,且是中國內陸核心,相對於深圳的精神,於是這種市場資本主義與集體主義的綜合模式被作者稱為「黃河資本主義」。參閱:本書,頁53-54。

³ 臺灣譯為「審議式民主」。

⁵ 中國夢=經濟發展+政治主權+國際法 律。

的途徑。這三者的共同發展,就是作者所謂的中國「圍城世界」,即民族國家可在全球市場上彼此交易,同時不失對自己的經濟未來、政治體系與外交政策的掌控。

三、代結論:全書總評

筆者以為作者這樣的處理方式是 相當合宜的。無論當下中國知識分子 的主張或構想曾獲得政府大力的支 持,但他們仍然有著被壓制與審禁的 威脅。雖然威脅的存在,中國還是一 個「知識分子掛帥」的政治社會,政 府高層仍會邀請這些思想家對他們簡 報。中國的高壓政治,沒有反對黨, 媒體的功用是促進和諧而非監督政 府,因此知識分子在中國的地位仍屬 較高,雖然他們可能會成為政爭的犧 牲品,但他們卻也戮力地反映其眼中 的底層社會。雖然重大的決定仍是由 領導人拍板定案,但知識分子的爭辯 不休,早已成為中國政策制定過程的 一部分。

這本書除了上述的價值外,有幾個部分是需要批判的。首先,作者從政治、經濟,與外交等三個方面堆砌完成其所謂的「中國圍城世界」,但 筆者以為其中隱含了西方中心論的元 素⁶。舉例言之,作者不斷企圖印證中國幾項的轉變在世界上的重要性與西東性與西東國會改變在世界中國會形成內會的世界秩序,而以會的世界發展的世界發展的世界發展的世界發展的一次是世界發展的世紀。因為作者只是要「提起」而不會對於不世界的改變所可能對於實力。 發酵與後續影響⁷。

限定的空間範疇⁸。中國的天下秩序不 是霸權的延伸,也不是刻意的支配, 反倒是一種文化的傳播,而且向內治 朝貢的地區仍然保有自己的政治制 度。⁹另外,作者對中國宗教的了解可 能不深,他說法輪功是以吃素聞名 的,¹⁰但是吃素與否只是法輪功修煉 者的「但書」,不是絕對。

最後,作者寫作原意就是欲藉不 同知識分子間的看法,築就出當代中 國的發展道路。但作者的觀察點似乎 僅限在知識分子對政治、經濟與外交 三個方面,而忽略了知識分子對於更 廣大的市民社會發展上的想法與辯 論。例如從去(2008)年底造成一股 話題的《零八憲章》來看,雖其是由 知識分子起草,但後來加入了許多長 期關心中國發展的市民與農民,共同 造就出一份市民社會對於中國發展的 前景宣言,也可說是市民社會發展的 表現。因此筆者以為,若本書的寫作 角度,再包含進知識分子對市民社會 發展上的想法與辯論,應當會更為完 整。

參考書目

王超華(編),《歧路中國》, 2004,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閏健(編),《民主是個好東西—— 俞可平訪談錄》,2007,北京:社會 科學文獻出版社

王小東,《天命所歸是大國——中國:要做英雄國家和世界領導者》, 2008,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10 參閱:本書,頁140。

^{8 「}天下」對傳統中國而言,再搭配上皇帝 制度,指的是天子(皇帝)應然支配的領域 (all under heaven),「天下」與「皇 帝」制共同形成了「天子受天命統治天 下」,故言「天下」是一個限定的地域(朝 貢—冊封體系),而不是指「世界」。「天 下」一詞在中國與日本史學界是一個專有名 詞,日本學者西嶋定生便認為近代以前是複 數世界,例如地中海世界、東亞世界……等 並存,而東亞世界又包含了中國、日本、韓 國、越南等地,中國則是東亞世界的核心, 因此「天下」與「世界」是不相等的概念。 9 中國的天下觀可參閱: 甘懷真, 〈東亞王 權的中國性:論漢字文化圈〉(2005,東亞 視域中的「中國性」與「歐洲性」國際學術 研討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東亞歷 史上的天下與中國概念》(2007,臺北,臺 大出版中心)。

²⁶

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家庭

顏維婷 / 台大政治所政論組碩士生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統計,截至 2008 年 8 月底,全台各地外籍移工總計有 37.3 萬人,其中,從事社會照顧者佔 16.7 萬,較前年同月底增長 3.6%¹。外籍移工作為台灣愈形重要的勞力供給且大幅度增長的同時,我們有必要對此現象有更全面性的耙梳與了解。藍佩嘉在新書《跨國灰姑娘一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家庭》做出了這方面的貢獻,她將台灣的家務移工放在全球化的地圖下,透過系統性解釋來理解台灣的家務移工現象。

嚴格來說,《跨國灰姑娘一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家庭》這本書是從英文「翻譯」而來,從作者 2006 的著作《 Global Cinderellas: Migrant Domestics and Newly Rich Employers in Taiwan²》翻譯改寫而成。全書聚焦在理解全球化下的家務分工,透過在台灣、菲律賓、印尼三處大規模的質化訪談,由六個章節外加上導論及結論共同組成,並由書解入加上導論及結論共同組成,實穿全書,是不作」(boundary work) ³(p40)理論作為貫穿全書,是因為人們習於在日常生活中透過各種不同的動作可是對分來區辨「我們」及「他們」。劃分的動作可能出於主觀認知或依循外在建構,界線可以是語過分來區辨「我們在建構,界線可以是語過過分來區辨「我們在建構,,我們往往透過看世界的方式。由於家務勞動在台灣長期被建構為「婦



書名:跨國灰姑娘—當 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 富家庭

作者:藍佩嘉

出版者:行人出版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日期:2008

頁數: 400 pages

ISBN: 978-986-84859-0-7

¹ 資料來源 http://www.stat.gov.tw/public/Data/810610244971.pdf

²由杜克大學出版,本書獲得 2007 年美國社會學會「性與性別領域」傑出專書著作獎(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Sex and Gender Distinguished Book Award) 、 2007 亞洲研究國際會議書籍獎:社會科學領域最佳研究(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f Asian Scholars Book Prize: Best Study in the Field of Social Sciences) (引自作者個人網站 http://pclan.social.ntu.edu.tw/index.htm)

³ 作者在此引用 Christena Nippett-Eng 的定義,界定畫界工作為 「我們用來創造、維持與修正文化分類的策略、原則與實作」。

職」的場域,具有性別上的畫界;加 上國際遷移鑲嵌在生產分工體系下, 使族群與階級在畫界上具重複性。因 此,作者將畫界概念放在全球化的移 工現象中,落實於性別、階級與族群 的界線上,用來解釋東南亞移工與台 灣(女)雇主間如何劃分彼此的社會界 線。

在行文順序上,作者先從結構層 次點出目前主導台灣、菲律賓與印尼 三方跨國家務勞動的政策脈絡。由於 一個國家對本國成員的集體想像會影 響到此國對公民身分的定義以及移工 政策的樣貌,因此從結構層面探究「界 線」的存在有其必要性。此外,結構 面的想像與限制也進一步規範仲介業 者與雇主的行為,於是,本著「誰是 外勞?」這個問題意識,作者描述仲 介業者如何透過招募移工的過程與大 眾媒體的再現,加深已經存在的「種 族化的階級主義4,來貶低東南亞家務 移工。這樣歧視性建構也影響著台灣 雇主與東南亞移工在日常生活的界線 劃分。

順著政策、媒體與社會所刻劃的 界線,作者接著便從家務勞動的需求 者與供給者這兩個角度切入,探討自己 體層面的雇主與移工如何界定的me) 與對方,以及雙方如何在「家」(home) 這個交會場域協調彼此的社會/空間界 線。這些系統性描述構成本書最一 的四個章節。在第三章藍佩嘉首先點 出女雇主如何透過「外包」的方式尋

4作者於此引用的是曾嬿芬定義的概念 (p.71),認為低階外勞之所以在本質上缺乏成為「台灣人」的基本條件是因為原來的階級主義被進一步種族化,形成種族的階級主義。 找「職務代理人」來完成道德傳統上 隸屬於女性的家務範疇,但仍舊依對 「妻子、母親的應有形象」的想像來 刻劃女主人與女傭人之間的界線。在 第四章中,作者透過移工的視角詮釋 這趟漫長旅程,描述其如何因為跨國 界勞動而造成自身在身分上畫界的流 動性。由於無酬家務勞動與有酬家務 勞動間的連續性⁵,因此女性移工不斷 在自家的女主人與他家的女傭這兩個 身分間進出擺盪。第五章進入實際空 間協商的權力關係,藍佩嘉援引高夫 曼的「前後台」理論, 說明社會認知 如何形塑移工在家庭與城市的空間位 置6,而移工如何透過空間轉換進行不 同的認同表演,以協商自己在公/私領 域角色的轉換。由於「家」是雇主和 移工最常相遇的空間,因此最後一章 則進一步探討彼此在「家」的空間界 線,並說明雙方如何藉由界線的協商 來保持彼此的社會距離。

在理論層次上,藍佩嘉扣著畫界工作,在族群、階層、性別的界線上皆做出了補充。她提出「階層化的智術的學問。 皆做出了補充。她提出「階層化的者化」(stratified otherization)將族群與階級掛在一起,恰恰反應了我們日常經驗上的理解與國際分工體系的建構形式。的確如她所說,他者並非中東一方。 完者,這從白領外國工作者通常報 受歡迎,東南亞移工普遍被視為藍領

⁵女性家務移工在母國可能因為「天職」進行 家務勞動,至地主國後因「工作」進行家務勞 動,前者與後者的工作內容相同,但卻因有無 報酬而有截然不同的意義。無酬與有酬家務勞 動因工作內涵相同而產生連續性。

⁶例如:「女傭的空間」應該是「廚房、陽台、 後火車站」。

的低階勞動者即可看出,不僅建構在 主觀上也呈現在政策層面的差異上。

本書更重要的,是提出「跨國階 級畫界」(transnational class mapping) 的概念,相較於主客二元論的一刀兩 斷,其強調的是關係性思考。由於遷 移而創造出的多重主體位置,讓移工 不再是純粹的被剝削者,雇主也不全 然是壓榨的資產階級,階級因此變成 可協商的界線,落實於不同情境之下 的「關係」中體現。這個概念加強了 移工自身的能動性與主體性,以及對 階級建構的多種可能性,不過作者也 不諱言,在這其中雇主的權力相較於 移工仍舊較大。此外,我認為由於台 灣的外籍勞工依行業別可分成製造業 和社會與個人服務業,相對於家務移 工在父權底下被視為「婦職」場域, 且雇主與移工大多為一對一的關係, 如何將「跨國階級畫界」此概念落實 於製造業移工上(通常是男性雇主且 為一對多的關係)需要更細緻研究, 也是值得努力之處。

 籲既踏實也急迫,畢竟,結構性的壓 迫與矛盾並不會因為回到個人層次而 消失,策略互動鑲嵌在結構之下,若 沒回到結構層面去修改,移工的處境 無法獲得全面改善。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本書除了第 六章直接從理論角度切入外,其他各 章皆從生活化的圖像開始。作者引導 我們的眼睛,讀一個移工的心情或讀 一個校門口前移工等著小孩的場景, 擯棄疏離或笨重的學術理論,作者說 的都是身邊常民的故事,讓本書讀來 除了有理論的深度外更有親切的故事 感。隨著台灣含括越來越多的新移民 之際,本書的出現不僅從知識上完整 剖析移工現象,更重要的是,作者也 替移工本身敘述了一個完整的故事。 如同作者於自序中提到菲律賓移工握 住她的手感謝有人將自己故事寫下 (p.13)的心情一般,本書在理論之外滿 載的是一個個出現在我們周遭的故 事。我認為第四章提供的視角特別值 得細閱,其描述了移工自我的心路歷 程與選擇,將移工放在說話者的位置 上呈現其主體性,而這也是身為台灣 人常遺忘或不曾注意的視角。

何以本書在已有英文版的情況 下,作者又勞力「翻譯」成成 推廣給台灣讀者呢?我想藍佩嘉無非 是想讓更多的「我們」在書中看到自 己。在這個層次上,《跨國灰姑娘一 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家庭》除 了是一本好讀的書。

酬家務勞動獲得制度性保障;第三、保障移工的人權以落實台灣民主、自由的立國價值。

⁷其提出的政策建議有三:第一、將照護納入 公民的基本權利以避免雇主對移工私人的剝 削;第二、視家務與照顧為專業的工作,讓有

【政治科學季評第23期徵稿啟示】

為能對當代政治學知識發展與時俱進,提升並促進學術之反省對話,推動全國政治學相關系所之學術參與及交流,本刊公開徵求對政治科學相關學術著作之「書評」與「書目」,期許引領暨提升學術研究之風氣。

投稿須知

- 徵稿對象: 全國政治科學相關系所師生
- 稿件內容:
 - (一) 短篇書評:針對政治科學相關中外文學術著作之評論(其中至少應 有二分之一以上篇幅作為內容引介),約 2000 至 2500 字。
 - (二)長篇書評:針對三至六本政治科學相關中外學術著作之綜合評論,約 5000 至 8000 字。
 - (三) 書目:針對政治科學相關學術著作之介紹,約1000至1500字。
 - (四) 讀者回應:對前期刊登書評之回應,約1000至1500字。
- 截稿日期: 2009 年八月一日以前。
- 稿件筆潤:
 - (一) 短篇書評經審核後採用者,每篇新台幣壹仟貳佰圓整。
 - (二) 長篇書評經審核後採用者,每篇新台幣參仟圓整。
 - (三) 書目經審核後採用者,每篇新台幣柒佰圓整。
 - (四) 讀者回應經審核後採用者,每篇新台幣伍佰圓整。

■ 注意事項

- (一) 註釋及參考書目,請參考《政治科學論叢》體例。
- (二) 請勿以考試用書、教科書、會議論文作為投稿內容。
- (三) 稿件內容必須至少三分之一篇幅為評論。
- (四) 本刊物嚴禁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規範的稿件,違者除稿件一率不予錄用外,並將以本編輯委員會名義寄發通知信函給投稿人所屬單位。
- (五) 編輯委員會以尊重稿件內容為原則,力求避免修改,惟保留此項權 利。
- 本刊物嚴禁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規範的稿件。編輯委員會以尊重稿件內容為 原則,力求避免修改,惟保留此項權利。
- 投稿暨聯絡方式:
 - (一) 電子郵件:PoliSciReview@ntu.edu.tw
 - (二) 一般郵寄:台北市中正區(100)徐州路21號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暨研究所 政治科學季評編輯委員會

Working Across Boundaries: Collaboration in Public Servi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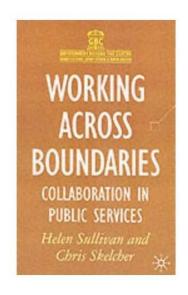
張國偉 /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博士生

話說 1970 年代,西方許多先進國家都產生了「政府超載」(overloaded government)的問題,政府職能愈龐大,所需提供的財貨與勞務也就愈多,但資源畢竟有限,所以民眾的需求無法一一回應。政府一方面必須面對財政上的困難,另一方面民眾對於公共服務需求的質與量卻日益提升,國家面臨到嚴峻的「雙環困境」(Catch-22)。本書作者 Sullivan 與Skelcher,將此時期的國家比喻為「超載國家」(overloaded state)。

到了80年代,公部門為解決70年代所生之問題,開始了民營化與政府精簡的各項行動,以至有了90年代的新公共管理(NPM)思潮。政府不斷的把職權讓渡出去,使得傳遞公共服務的組織分化破碎而無力回應環境中的需求,產生了公共行動的責任、課責和公權力喪失等嚴重問題。作者又將此時比喻為「空洞化國家」(hollowing-out state)。

時間來到 2000 年之後,西方許多先進國家驚覺到,職權讓渡委外的結果,企業、非營利組織以及公民都可能是公共服務的傳遞與提供者,並產生出多種的治理模式,可能是科層、市場和網絡,與其他各種不同的行動者,一同協商、規劃與執行公共服務計畫。此時期的國家比喻為「擁塞國家」(congested state),於是各部門的協力行動就此開始,也為本書開啟了序幕。

本書作者 Sullivan 與 Skelcher 提到所謂的協力 (collaboration),是藉由一項共同計畫與其他人一起 共事,並分享正面的產出利益;且不同行動者之間 既存的僵固界線(boundaries),例如:公私部門、不 同層級的政府、志願性組織及社群等等,應該也藉 由協力來達成跨越組織界線相互合作的目標。由此 可知,廣義的協力,為兩個以上的行動者規劃與執



書名: Working Across Boundaries: Collaboration in

Public Service

作者: Helen Sullivan& Chris

Skelcher

出版者:Palgrave Macmillan

出版地:New York

出版日期:2002

頁數: 271 pages

ISBN: 0333961501

行共同行動計畫,而此行動者可以是人際(inter-personal)、團隊間(inter-group)、機關間(inter-agency)、組際(inter-organizational)、府際(inter-organizational)、院院院(inter-branch)與部門間(inter-sector)等,不限定於公共服務計畫的範疇,不限定於公共服務計畫的形式主題的形式有助的表現。全書中作者主要提協力行動的表現。全書中作者主要提協力的形式有那些?有那些因素會評估協力行動的績效?最後是如何評估協力行動的績效?並從這些問題分別去論述協力的內涵。

第一,協力為何會產生?如上述 所提到的,作者認為一則是新公共管 理改革的結果,另一則是,因應政府 新治理模式的需求。進而產生出四大 現象,使得協力成為達成公共目的的 主要途徑:(1)國家角色的改變,產生 新的治理形式 (governance patterns): 現今公部門與私部門、社會與國家的 界線日趨模糊,過去以國家為主的統 治核心已遭解構,新興治理結構被重 新塑造。(2)國家政策失靈(state failure):面對變動快速的外環境,國 家已無力一一解決,需要其它夥伴的 協助。(3)對國家的期望與架構的改 變:例如世界衛生組織(WHO)及歐 盟(EU)的治理架構,創造出許多公 私社群夥伴,以解決社會及經濟問 題。(4)共同問題 (common problems) 的產生:例如全球暖化及反恐等議 題,這些是跨公私部門之間的共同問 題,產生了必須攜手解決的合作需求。

第二,協力的形式有那些?作者 歸納許多學者的見解,認為協力的形 式可以加以概念化成光譜的形式。在 其中一端是非正式且特殊的「網絡」 關係。而另一端是高度結構化及正式 的互動關係,最後可能導致協力雙方 結合成單一的「科層體制」。然而,正 式化的程度若低於完全整合時,則稱 之為「夥伴關係」: 意指各行動者以相 互同意的目標作為基礎所形成的動態 關係。以理性原則劃分工作範圍,追 求每位參與夥伴的利益。所有的參與 者會相互影響,試圖在合超效果 (synergy) 與自主性(autonomy)之 間取得平衡,並且納入相互尊重、公 平參與決策、相互課責以及透明化 (transparency) 等原則於行動中¹。光 譜的連續性在本質上掌握了參與者的 互動程度;而參與者的互動程度是依 據自治能力、管制形式,以及依據明 確的規則所串聯出的執行結構。

作者藉由英國跨部門議題 (cross-cutting issues)的案例,例如: 都市更新、社區安全與健康照護、和 會照護,來佐證協力的重要性。然為 他們也認為政府一般事務最常出現的 他們也認為政府一般事務最常出現的 以代理人之關係,形式是簽約外人與 代理人之關係,容易產生問題;其略 以內人之關係,除了必要的水平協力 於中更提及歐洲系絡中,各層級政府 之間的垂直協力。

第三,有那些因素會影響到協力 合作的績效?作者在此認為大致上可 分為兩大類因素。其一,個人因素:

Brinkerhoff, Jennifer M. (2002). "Global Public Policy, Partnership, and the Case of the World Commission on Dam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62(3): 324-336.

提到個人是否有足夠的結盟技巧與能 力,以及能否信任你的協力合作夥 伴?再者,則是個人的領導能力,是 否能勾勒出未來的願景,以及設想出 達成願景的策略。其二,組織因素: 組織本身是否具有開放性的組織文 化?還有官僚體制中的專業主義可能 會阻礙協力活動的進行。所以,作者 强調「協力能力」(collaborative capacity)的重要性,認為協力能力亦 可分為個人能力與組織能力。其中個 人能力包含:協商溝通、結交網絡、 具有同理心、勾勒願景與組織力; 而 組織能力的部分為:組織文化、組織 學習、組織領導;而兩者都強調信任 的重要性。

第四,如何評估協力行動的績 效?作者首先提到協力的動態性。作 者認為協力運作並非靜止不變,反而 是成員、領域和資源隨時都在變動, 會影響到協力的議程及行動。文中以 生命週期典範分析其動態性,將協力 視為一串連續的過程,其主要可以分 成:共識形成前(pre-conception)、創 始、正式化、運作、終結或賡續等五 個階段;而協力可能會在其中任何一 個階段中夭折,並非所有的協力關係 都能順利走完全部階段。由此可知, 一份共同行動計畫,在每個階段或環 節上,都應謹慎評估其細節的可行 性。所以,協力的評估在各階段中, 有不同的評估標準及方式,包括:從 一開始選擇合作社群的評估與利害關 係人的評估;接著可用過程與結果的 評估。而事後則可用產出效果的評 估,或者使用「金錢」為衡量標準的 評估。

1990 年代為了讓公民的需求有更 好的回應,紛紛師法企業使用降低成 本提高效率的手法,例如:民營化、 委外 (outsourcing) 與契約外包等。使 用這些競爭策略的結果,使得提供公 共服務的組織分散而零亂, 甚至為了 競爭效率而破壞了我們的好山好水。 如同在國片「海角七號」中,鎮民代 表的經典台詞:「山要 BOT!土地要 BOT!現在連海也要 BOT!錢都給你 們台北人賺去, 留給我們恆春人什 麼!」這道出了新公共管理思潮所帶 來的後遺症。再舉 1990 年代,英國國 營鐵路外包的案例,分段外包的結 果,造成嚴重的火車出軌公安問題。 所以,一味地強調效率與市場競爭機 制,而沒考量到這些公共服務的本質 是否適合委外,確實產生許多問題。

因為必須回到公共服務的本質來 决定提供的方式,因此必須將此服務 相關的成員納入思考,共同協力完 成。而 Sullivan 與 Skelcher 一再強調能 夠共事協力的前提是, 行動者雙方面 對著相同且有待解決的問題,雙方可 以在這個問題上提供資訊、資源並一 同打拼,解決問題後的效益是共享 的,且這種合作是長久的、可建立相 互信任的機制。現今公共事務所涉及 的人數與範圍比起以前要來得大許 多,各方不同的利害關係人往往面對 著相同的問題,能夠協調出共識才能 順利推行,最好的方法當然是將各方 利害關係人納入協商討論並且參與規 劃執行,所以協力(collaboration)比 起競爭(competition)更能夠達到一加 一大於二的合超效果。

再者, Boyte(2005)認為現今公共

事務的發展,強調的是整體面向的治 理 (governance), 而非只有政府 (government)的傳統角色與功能。這 種新治理結構的啟動涉及到典範的移 轉,包括:公民應該從簡單的選民、 志工與顧客轉變為問題的解決者與公 共財的共同創造者 (co-creators);而 公共領導者,例如公共事務的專家與 政治人物,應該從服務與解決方案的 提供者轉變為公民行動的協力夥伴、 教育者與組織者 (organizers); 而且應 該從投票式的民主轉變為具有實質內 涵的民主社會2;上述的觀點亦呼應 了,行動者必須實質參與其中,才是 真正的協力,而培養他們能與別人合 作協力的能力就愈顯重要。

然而,沒有方法是萬能的,就連 協力也不例外。Bryant(2003)提到原本 對協力有興趣的行動者,因遭受壓迫 者(oppressor)的威脅,而成為讓步者 (appeaser),更糟糕則變成協力計畫 的逃兵(defector),最終成了合作的懷 疑論者 (sceptic),以此形容組織之間 協力合作的困境3。協力雙方常常各有 各的立場與偏好,如何協調出一套雙 方都認可的共同行動計畫,並不是一 項容易的事。甚至資源較多、勢力較 大的一方,容易向另一方施壓脅迫, 企圖讓弱勢的一方妥協讓步,這往往 是讓協力計畫無疾而終的起因,不可 不慎。這部分也是 Sullivan 與 Skelcher 在書中較沒有提及的地方。

「協力」不可否認是現今相當為門的觀念,也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政策工具選項,但應用前應協力或務所,但應用前應協力或夥伴關係等留為,不該停留在未來的發展上,實作的設計與管理人。例如,協力流程的設計與管理、與大方面,本書提供的安排。在此方面,本書提供等相關素材,是一本值得細讀的教本值得細讀的表

Boyte, Harry C. (2005). "Reframing Democracy: Governance, Civic Agency, and Politic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65(5): 536-546.

³ Bryant, Jim (2003). The Six Dilemmas of Collaboration: Inter-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s as Drama, NJ: John Wiley & Sons.

馴服美國權力:對美國首要地位的全面回應 (Taming American Power: the Global Response to U.S. Primacy)

洪銘德 /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博士生

作者的主要目的在於解釋為何其他國家對 於美國感到反感,探討世界各國對於美國霸權地 位的反應以及美國應該如何運用自身的權力加 以因應。內容分為六個部分:導言;第一章指出 美國霸權地位所面臨的問題及其外交政策;第 二、三、四章論述仇恨美國的根源以及其他國家 所採取的反抗或合作戰略;最後一章則指出離岸 平衡為美國最理想的戰略,能夠極大化美國的國 家利益且極小化世界各國與美國相互對抗的力 道。

第一章描述美國全球霸權外交政策,首先作 者分別從經濟的主導力量、軍事的超強地位、制 度的影響力、文化與意識形態的影響力以及得天 獨厚的地理優勢,論述美國全球霸權地位的基 礎。其次指出美國透過貿易政策、貿易自由化以 及促進美國關於民主與人權的理想等方面,塑造 本身的霸權領導地位,並指出美國因霸權領導地 位所展現出傲慢的心態而招致911恐怖攻擊事件 的發生。換言之,美國正處於一個前所未有的霸 權領導地位,美國利用貿易、金融、民主與人權 等方面的能力,塑造一個符合自身國家利益與價 值的世界,然而小布希政府並沒有採取維持現有 領導地位的作為,反而追求不受約束的霸權領導 地位與指明並對付潛在的威脅,並進一步推動美 國理想與制度的傳播以提高美國的全球領導地 位。

第二章探討了憎恨的根源,說明美國世界霸權地位引起全世界關注、擔憂以及憎恨的主要原因。雖然霸權地位讓美國能夠隨心所欲地行動,



書名:馴服美國權力:對 美國首要地位的全面回應 (Taming American Power: the Global Response to U.S Primacy).

作者: Stephen M. Walt

譯者:郭盛、王穎

出版者:上海世紀出版集

專

出版地:上海

出版日期:2008

頁數: 223 pages

ISBN: 9787208081208

但同時也帶來了危險,因為這可能 造成反美聲浪的高漲。憎恨美國的 原因為:1、對於美國權力的畏懼1; 2、抵觸美國的價值觀,美國式理想 的吸引力以及文化的影響力雖鞏固 了美國的霸權地位,但也引起反美 的情緒;3、美國過去與現在的作為 加速了反美主義的產生,過去所採 取武力干預或侵略他國作為引起了 反對的聲浪,而現今所採取的單邊 主義、先發制人作為則更加深了他 國的反感與憎恨。另外,由於美國 的民主與雙重標準, 嚴厲地要求他 國遵守國際法,但自己卻不加以遵 守。最後,作者則指出美國不知道 其他國家為何感到驚恐,甚至是反 美的原因²。

常規戰爭、恐怖主義、大規模毀滅 性武器以及後兩者(恐怖主義與大 規模毀滅性武器)的結合抗衡美 國。2、妨礙 (balking): 拒絕依據 美國的要求行事,拖延或不盡心盡 力以及扯美國後腿;3、約束:利用 國際制度約束美國的作為;4、敲 詐、勒索(blackmail):採取美國認 為具有危險或威脅性的行動,藉此 换取美國的讓步並獲得本身想要的 東西,如北韓核武危機即為典型的 例子。5、去合法性:將美國描繪成 一個自私、殘忍的國家,藉此引起 質疑美國全球領導地位的聲浪,一 方面使得美國無法獲得國際支持, 另一方面則引起美國內部的自我懷 疑。

第四章,作者論述了追求或支 持美國國家採行的戰略,分別為1、 西瓜效應 (bandwagoning):採取與 美國一致的行動,因為可以避免被 強迫或懲罰,亦即成為美國的追隨 者而非抵抗美國。2、區域制衡:希 望獲得美國的保護以對抗鄰近的區 域威脅,或藉此獲取美國的支持以 提高本身在區域內的地位。3、建立 親密關係 (bonding): 努力與美國 官員建立親密私人關係的關係,擁 有更多影響美國觀察事情角度的機 會,而有助於影響美國的外交政策 制定。4、渗透 (penetrating):操縱 美國國內政策以間接地影響其外交 政策的制定,亦即藉由對國會山莊 的公開遊說、影響特定的立法,並 使得一些國會議員成為該國的支持 者。另外,有些國家則透過公共關 係、媒體活動以及其他形式的宣傳

對於美國權力的畏懼的原因為 1、美國過去曾使用其權力傷害他國;2、利益衝突將不可避免產生,所以小國不得不依照強國的偏好調整自身的政策作為;3、美國超強地位所造成的權力不平衡而讓其他國家感到恐懼,因為沒有一個國家知道美國未來的作為走向。

² 反美的原因為 1、權力不對稱的關係,而使 得其他國家對美國反感,且使得美國無法辨別 產生的原因; 2、美國無法關注全世界所有區 域,注意範圍有所限制,當然也無法知道反對 美國的根源所在地; 3、美國的形象遭受盟友 與代理人的醜化; 4、歷史的遺忘,雖然美國 極力地遺忘過去那些美國的殘酷行動,但其他 國家卻無法這麼容易的忘記。

影響公眾輿論,藉此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制定造成影響。

此外,美國也應該避免其他國 家聯合抵制美國。美國可能採取的 戰略有:1、全球性的霸權(global hegemony):依據本身的國家利益 來掌控這個世界;2、選擇性的接觸 (selective engagement):透過雙邊 或多邊的合作而可以繼續在歐洲、 亞洲、中東以及波斯灣部署軍事力 量以減弱區域的安全競爭,同時也 能夠控制大規模毀滅殺傷性武器的 擴散。3、離岸平衡 (offshore balancing):美國的傳統大戰略,在 重大國家利益受到直接威脅時,美 國會在該地區部署軍事力量,但這 是因為區域的大國無法維持區域權 力平衡時,美國才會介入。

離岸平衡是當今美國最理想的 大戰略,因為它能夠減少耗損緩反 的權力,並減緩反的權力,並減緩反的權力 的力道。 於調對區域盟國的依賴 於順序,強調對區域盟國的稅稅 以介不必優勢以及區域內內 國地緣的猜忌超過於對美國的 彼此之間的猜忌超過於對美國的憂 慮,而使得他們願意幫助美國。對 此,美國所應該採取的步驟如下: 1、美國必須謹慎地運用自己的權 力,藉此吸引他國而非引起反感, 誠如威爾遜總統所指出的,美國必 須扮演一個真正的自律大國,認清 自身的力量但又不會濫用它。2、阻 止他國聯合起來反對美國,必須避 免將潛在的敵國看成是整體,因為 這將會促使他們結合起來對抗美 國,例如通稱北韓、伊拉克、伊朗、 利比亞、敘利亞以及其他國家為流 氓國家,忽略了他們之間的差異, 錯過與一些國家改善關係的可能 性,甚至可能使得他們聯合起來對 抗美國。

藉由對照作者的觀點與小布希 政府時期所採取的外交政策,我們 可以清楚地了解為何美國外交政策 會遭遇到如此大的反對聲浪與困 境,因為小布希政府不僅忽略了歷 史的仇恨這一個重要因素,更重要 的是採取了一系列單邊主義的外交 政策,如:退出京都議定書、反彈 道飛彈條約、生化武器公約以及國 際刑事法庭公約等,甚至在911恐 怖攻擊事件之後,對伊拉克發動單 邊主義、先發制人的攻擊。如此一 來不僅無法防止恐怖主義攻擊與保 護美國的國家利益, 更重要的是讓 世界各國更加痛恨美國。誠如 Robert J. Art 在《美國大戰略》(A Grand Strategy for America) 一書中 所提出的美國八大戰略,雖然兩人 所認為美國的理想戰略並不相同 ³,但是兩者皆在回答一個問題,即

Art 是認選擇性干預戰略是這個時代的最好選擇,不僅能夠選擇對美國最有利的目標,並

美國未來的外交政策該何去何從呢?由於過度的擴張與權力的濫用,每一個霸權終將走向衰落,而 美國亦可能無例外地逐漸走向衰落 的路途⁴。

進言之,與其他學者一樣,Walt 的主要目的也是提出能夠減緩美國 霸權衰弱的大戰略,但更重要的是 Walt 清楚地指出憎恨美國的原因以 及那些與美國相互對抗的戰略。如 此一來,可以讓新上任的歐巴馬政 府做為未來政策制定的參考,以彌 補小布希政府時期對於美國國際形 象所造成的嚴重損害,藉此重塑美 國良善霸權形象, 鞏固其世界霸權 地位。因此,新任的國務卿希拉蕊 在出席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的聽證會 時即指出,美國需要運用「巧實力」 (smart power)應對紛繁複雜的世界 形勢,以重塑美國良善霸權的形 象,並減緩世界各國與美國相互對 抗的力道。

根據上述,顯示出 Walt 對於當 今美國外交政策的獨特見解,因為 某種程度上,歐巴馬政府的「巧實 力」外交政策主軸回應了他的觀 點,所以強調採取混合硬權力與軟 權力兩者之具有彈性的外交政策。

且以最有效的方式來達成這些目標。中長期而言,它比孤立主義與離岸平衡戰略更有助於美國的利益,且僅需付出較小的成本、風險也較小;而 Walt 則認為離岸平衡戰略是當今美國最理想的大戰略,因為它能夠減少耗損構築美國霸權地位的權力,減少美國所帶來的反對勢力。

⁴ Paul Kennedy 著;張春柏等譯《霸權興衰史》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台北市: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1995年),頁705-710。 儘管離岸平衡戰略與「巧實力」外 交政策之做法有所不同,但是兩者 的目的是一樣的,亦即延長美國霸 權地位的時間。